

征求意见稿
供内部讨论
请不要翻印

華僑史論叢

(二)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中國史學研究所華僑史研究室
《歷史教學問題》編輯部 合編

一九八二年 二月

目 录

华侨史研究的对象、课题和任务	吴泽、李家善
〔特约稿〕三代华人在美国	(美) 吴定一
近代华工在南非	艾周昌
泰国华侨史论略	高宝辉
〔翻译〕中国历代华侨政策的变迁	沈云鸥
〔资料〕旅美华侨简况一二事	梅公毅
〔资料〕美洲的发现	李其勋
〔文献〕1904—1906年英属南非召募华工资料	艾周昌

华侨史研究的对象、课题和任务

吴 泽 李家善

海外侨胞，人数逾千万，足迹遍天涯，对世界各地之开发及人类文明之发展厥功甚伟，对祖国之革命与建设鼎助尤多。他们身在海外，心怀桑梓。中华民族的这些仁人志士，理当谱写成中国历史的宏伟篇章，以反映我国多民族、多支脉的历史特征。我们认为写一部完整的《中国通史》著作必需列有各历史时期华侨活动的章节，俾成为名符其实的中国历史的完篇；我们华东师大历史系有鉴于此，已于去年开出新课《华侨史讲座》，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为使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相互促进，我校中国史学研究所近复增设了华侨史研究室，工作正积极开展中。值此草创阶段，我们深感某些有关华侨史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有必要首先予以探讨，以利研究工作之进行。

一、华侨史学科的专业性

侨民活动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世界范围的现象，与人类历史的进程相适应，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起过重大的推动作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侨民总是互通有无、开发地利的使者，因而闪烁着血与汗的灿烂光华；他们也曾是地理大发现前后的拓荒者，栉风沐雨，披荆斩棘，创造了整整一代的光辉文化。然而应予区分的是，帝国主义殖民时代，沾染着食利者的贪婪与暴虐，参与开疆拓土、奴役剥削的殖民活动的那帮人，并不是“侨民”。例如17世纪的葡萄牙在马六甲的香料贸易，实质上是王室贸易，具体经营者是殖民官员，搜刮民财，巧取豪夺，这帮人以国家武力为后盾，纯属军事移民性质，不属于侨民的范畴。因此，侨民与殖民者，前者是和平移民，后者是军事移民，两者性质截然不同，不容鱼目混珠，混为一谈。又如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列强以不平等条约之片面优惠，操纵中国经济命脉，吮吸我民脂民膏，其经纪人虽有侨民身份，实质上是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下的一种政治移民，也不成其为正常意义下的侨民。

从世界范围来看，就古希腊罗马来说，奴隶制的兴盛，经济发展，贸易频繁，侨民这个社会阶层乃应运而生。希腊文中，侨民为 $\mu\epsilon\tau\ \omicron\iota\kappa\omicron\varsigma$ ；

拉丁文中，侨民为 *metoec*。侨民的对称是公民 (*politēs, civis*) 和外国人 (*ξένος, foras*)。公民享有一切法律保护，外国人则为敌人 (*ἐσθρος*) 和蛮族 (*βαρβάρος*) 的同义语。侨民的地位居于公民与外国人之间。古希腊“侨民”有三个要素：一是外国人方面有在一个城市定居的明确意向；二是在该处确有住所；三是定居有一段时期并缴纳纳税。侨民之接待一般要视国家政策而定。例如雅典是宽容的，斯巴达是排拒的。主要因为雅典是一个民主的重商国家，斯巴达是一个专制的重农国家。史学家色诺芬曾盛赞侨民对雅典经济繁荣的贡献，柏拉图曾说侨民定居期可达二十年。足见侨民都是和平移民，并受到政府和学人的重视。从国际交往上来说，国家对侨民的承认，冲垮了排外的民族藩篱，削弱了仇外的习惯态度，也使残酷的战祸得到缓和。“侨民”这个概念的确立，开拓了人民交往的领域，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前进。

我国接待侨民，见于正史者，早在公元226年（孙权黄武五年），“有大秦贾人字秦伦来到交趾”。元魏时（公元420—60年）于洛阳设“馆”接待“来附者”至唐而大盛，长安一地，“贞观开元，薰街充斥”，其余扬州、广州、洪州数处“胡人”亦多，大率为经商而来。宋代专设“蕃坊”，法亦优惠，宛若“特区”。元代拂林人爱薛，曾入仕，授平章政事，封秦国公，卒，追封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拂林忠献王。足见我国接待侨民，时间之早、规模之盛、优遇之厚，世罕其俦。

侨民离国侨居，原因不一。古罗马的侨民，是托庇于国力雄厚的罗马，免受本国政局之纷扰，以利商业之经营。中世纪的欧洲，封建社会这个阶级社会，上至君主，下至农奴，各有固定的和永久的住处。人民群众即使在土生土长的地方，也不容许随意迁徙，或移居外国。在当时“海禁”是个普遍现象，英国亦然。17世纪的英属北美殖民地，系由领有三室执照的“法人”公司以及由英王授权的“领主”两种殖民代理机构主管，由于急需劳动力，移民主要来源是“契约奴” (*indentured servants*)，其中许多是英国监狱里的罪犯，此外还有“劳偿乘船工” (*redemptioners*) 和黑奴 (*negro slaves*)。

“新英格兰”南部全欧移民的三分之二是受奴役者。上述“契约奴”，为了偿还旅费，缔结了劳动四、五年的私人合同，有些人是被拐骗来的。白种“契约劳工”，包括较多的“劳偿乘船工”，到达后需偿还船费，或做工还债。第一船黑奴是于1619年在弗吉里亚登陆的，

约在 40 年以后，黑人的永远奴役制度就“合法化”了，他们在烟草农场和租田里代替了白种契约工的繁重劳动。1865 年禁奴以后，“契约华工”乃取而代之。

1607 和 1680 年的自由移民，较少因为圈地运动而沦落的哀怜无告的贫民，因为贫民缺少身入异域独自经营的技能和精力。约有三分之二的移民属于能自筹旅费并能独立营生的家族，其中许多是害怕 1620—1630 年间的政局动荡，至于贵格会教徒在 1660 年确实受到了迫害，有些人是在农业和制造业衰退时期逃离出来的。由于 17 世纪英国发生人口过剩现象，至此移民才被认为是合法的。但是在 1680 年以后，对母国人口的继续减少，即使是流动到自己的殖民地去，也引起了英国工商界的不安，因此只有英国政府乐于摆脱的那些贵格会教徒，才集中到新泽西和西印第安纳去。18 世纪末，1790 年美国人口普查，英格兰人占百分之六十，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占百分之十四。到 19 世纪，1882 年为移民高潮，到达 8 百万人。20 世纪，1907 年达到最高额，为 1 千 2 百 8 5 万 3 千 4 百 9 0 人。如果说 17、18 世纪宗教迫害是自由移民的动因，那么 19、20 世纪自由移民的动因则是过剩人口剧增，饥馑和其他经济灾祸。特别是随着工业革命而来的技术改革，使大量工农群众被排斥于常规社会组织之外，他们被迫离乡别井，远渡重洋，到新大陆自谋出路，创家立业。侨民活动是受侨国人口政策的一部份，人口有数量和质量的不同要求，地广人稀、资源丰饶的国家，固然需要劳动力以资开发，但随着科技与文化水平的提高，智力资源也受到重视。美国至今每年移民的法定额为 12 万人，其中百分之 20 的优惠给予高级知识分子。美国这个号称“外来人的”国家，历史上是最大的受侨国，目前也仍然为此。

我国的海外侨民叫华侨。“华侨”一词出现较晚，通说是随着 1898 年横滨成立“华侨中学”才流行起来的。但华侨活动早在公元前一世纪就有了开端，这件事记载在公元五世纪亚美尼亚史学家摩西所著《史记》一书中。西汉时期侨踪遍布东南亚及印支各国。唐宋以后，华侨活动的记载，史不绝书。如唐杜环《经行记》、阿拉伯马素《黄金牧地》、宋洪迈《夷坚志》、明马欢《瀛洲胜览》等，多所描述。到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的洋枪大炮轰塌了闭关自守的神州门户，中国的侨民活动在这时期就打上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烙印。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晚清

的“海禁”是由不平等条约（1860《北京条约》）解除的；二是华侨的出国是以清王朝同意的列强“招工”形式进行的；三是“招工”沦为清王朝与帝国主义列强分赃的剥削手段。19世纪下半叶，澳门、香港和新加坡，成为远销美澳和南洋的中国“猪仔”的国际转运站，破产的沿海乃至内地的农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下，走投无路，哀告无门，逼不得已而把自己有权支配的最后和唯一的财产——自己的人身拍卖掉，去当“契约劳工”（俗称“卖猪仔”）。而1904年清王朝所订“中英南非招工章程”，招工范围从沿海扩大到京师乃至内地，英帝国主义豢养的“招工头”和英国人自己，深入民间，公然拐骗。仅从天津关出洋的华工计有三十二批，而至1910年（宣统二年），由南非重返天津关的只有二十六批，南非招工总数竟达三十五万之众，而伙同英帝贩卖中国人口的清王朝，从出洋华工身上抽所谓“身税墨洋”，每人三元，仅据秦皇岛招工所的统计，招工期间两三年，清政府计收入十三万以上。凡此种种种足以说明“契约华工”不同于英国的“契约奴”，前者有官方强制的因素，而官方又受制于列强，至于非洲劳工如此，这是决定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的。当然，以上史实并不排斥19世纪的中国自由移民，新加坡在当时就是中国自由移民的一个据点，也是新加坡今天成为最大的华族社会的一个历史原因。而现代的中国侨民活动的流向，从19世纪的南流转向东流，即从南洋转向美国，这种潮流的转交，无疑是受国际关系格局的制约的，目前在美国的侨胞约占侨胞总数的十三分之一。

综上所述，侨史源远流长。作为中国历史组成部分的华侨史，对近现代世界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进程，更是息息相关，影响深远。现在我们把华侨史作为一个专业，首先对华侨史的学科独立性要明确起来。根据上文所列举的种种情况，我们认为华侨史不同于“国际关系史”、“中西交通史”、“中外贸易史”、“中国外交史”等学科。华侨史作为一个专业，它的学科独立性主要可归纳为：

（1）侨民活动以个体（或家族）为单位，自由移民是它的代表形态，与外交活动并无直接关系。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百二、三十年延续期的“契约华工”，则是一个特定的研究课题，这种特定研究课题天地广阔（下文将予以探讨），都是华侨史学科独立性的所在；

（2）凡国家政策之贯彻（明“三保太监”七下西洋）或封建帝王个人

意旨之执行（秦徐永——徐福——的东渡日本），此类活动均非出自自谋生计的个人动机，不能称作侨民活动，侨民活动也排斥军事移民和政治移民，而在中国史上是不存在这种问题的；

（3）侨民活动不论是自由移民还是强制移民，都有它的特定历史背景，不但影响受侨国对侨民的开放或排拒，而且影响侨民在受侨国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处境甚至最后归属。但这些背景材料是华侨史的“参数”，不能以之代替华侨史本身。这也是华侨史学科独立性的要求，因为那些“参数”学科都是自成体系、学有专攻的。

确立了“华侨史”学科独立性以后，现在进而谈谈华侨史研究的对象问题。

二、华侨史研究的对象

“华侨”一词，一般常作为华侨、华人、华裔三者的通称。例如“侨汇”一词就包括了三种人的国际汇款，“华侨商店”则包括了侨眷。因而这种通称也可以说是一种民间俗称。但从科学意义上来说，华侨、华人、华裔是各有含义，不容混同的。略作说明如下：

关于“华侨”，1950年我国侨务委员会规定：“凡侨居国外，从事工业、农业、商业、教育和自由职业的中国人及其子女，侨居时间达一年以上，其生活费用依靠在侨居地从事各种工作而获得的都是华侨。简言之，“华侨”指的是侨居外国谋生的中国人及其子女。拿美国来说，在中国人的侨居问题上有个三次大起大落的过程。以1868年“中美续增条约”（亦称“蒲安臣条约”）为始，条约第5条规定：“大清国与大美国切念民人前往各国，或愿常居入籍，或随时往来，听其自便，不得禁阻……两国人民自愿往来之外，别有招收之法，均非所准。”这份出自国务卿西华德手笔的条约，是美国允许华人入境、入籍的第一份外交文件，用意在为人口稀野沃的加州罗致廉价华工，用为修筑跨州铁路的“苦力”。据悉早在1852年侨居加州的中国人即达一万之众，只是帮助加州人种植和收获谷物的，而据当时人口普查加州共92,597人，华侨在加州人口比例中占到九分之一。但是关于1868年缔结“蒲安臣条约”时华工涌向加州的具体人数，国内尚无确切的具体数字。目前只知1871—1890这10年为19世纪抵美华侨人数最高时期，计为123,201人。但据1877年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调查报

告。至少有两处提到加州有中国人数达10万，其创造的财富估计为3亿美元。单拿这一点来说，足见中美人民的传统友谊，正是洒遍加州土地的华工血汗所浇灌栽培的。尽管“蒲安臣条约”所强调的“自愿往来”，所“非准”的“招致之法”，统统被所谓“契约劳工制度”、“赎单及”“债奴制度”、对付中国人的特设“征税”制度所冲淡和淹没，只留下了斑斑泪痕和殷殷血迹而已。

“蒲安臣条约”的“入籍条款”，据解释系以“互惠”为基础，包“美籍华人”大部源此条约而来。所谓“华人”指的就是加入了外国籍的中国人。这种国籍的改变，其法律意义就是效忠对象的改变。美国国籍法还规定，入籍者必须拥护美国政治体制和美国宪法诸原则。因此美籍华人有对美国效忠的义务。他们同时接受美国宪法的保护，并享有美国公民的一切权利。经过1882—1943年排斥和歧视华侨的阶段以后，美国于1965年颁布了新移民法，取消了对中国人的歧视，68年又取消了入境年度“定额”的限制，并适用了所谓“专长条款”。1970年美国人口统计宣布，中国人有百分之73是美籍华人，未入籍者为百分之27。根据1976年的统计，前此27年间中国人进入美国的人数达21万6千人。据悉目前美国定居着中国血统的人近80万。美国移民法规定，凡取得“永久居留权”者，定居5年后即可申请入籍。近十年来上述比率的增长情况尚无具体数字可考。从法律上来说，“美籍华人”已不是中国人，而是美国人了。

至于“华裔”，是指同化于侨居国的“华人”后裔，在语言、习俗上均异于母国，只是血统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已。而所谓“华裔美国人”，其法律意义亦同于“美籍华人”，只是修词色彩上强调他们和祖国的血统关系罢了。

这就是“华侨”、“华人”和“华裔”三者间的区别。如果要用个通称来表明血统关系，则可用“侨胞”，庶几可以概括起来。

面对上述情况，侨史研究的对象问题就产生了。我们认为有下面几点应予以考虑：

一、侨史研究既然属于中国史的范围，其对象应为侨居外国谋生的中国人的历史。这是理所当然的；

二、“华人”，在法律上与中国无关，他们对祖国并无法律义务，

也不受祖国的外交保护。美籍华人中有些是出生外国而取得美国国籍的，近年来在美国出生而取得美国国籍者，也多了起来。总的来说，源于居住年限而归化是美籍华人的“主产区”，至少目前如此，以后随着世代定居的延续，根据“出生地原则”而取得美国国籍的情况将会增多起来。然而，即使如此，他们归化前的先人的历史也仍然是中国人的历史，他们“华侨”父母的“根”仍然扎在中国的土地上，他们血管中循环不已的血仍然是炎黄子孙的血，他们的家谱也仍然要在中国来续。因此，侨史研究的对象，肯定要包括即使在美国传祀穷的归化者归化前的历史。他们当年仍为中国人，是效忠祖国的海外赤子，他们的历史当然是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管这种华裔的历史叫“华人前史”。“华人前史”应为我们侨史研究的极为重要的部门；

三、广大“华人”中不少出类拔萃的先进人物，栖居海外，创业维艰，在实业界、学术界甚至军政界崭露头角，德高望重；但是他们并不自外于母国，而以爱国行动来寄托他们的乡思，在精神上与母国息息相通，在物质上提供支持和帮助。这种崇高的感情和正义的行为，也见于普通的、平凡的，默默无闻的“华人”群众之中。对这些确有贡献的热爱母国的“华人”，给他们修续家谱、撰写行状，比照上述“华人前史”来说，就是一部富有生机的活的华侨史了。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华侨史研究的对象，应该是包括“华人前史”和确有贡献的热爱母国的“华人”历史在内的侨居外国谋生的中国人的历史。

前文记述华侨史的专业性时，提到特定研究课题天地广阔，现在就谈谈华侨史研究的范围。

三、华侨史研究的课题

华侨史研究，有纵向的和横向的两大课题。从纵向来说，无非是华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部分到全局的各个阶段的寻踪探迹、究本溯源的研究，这个工作在我国已有了良好的开端，宿学鸿儒，颇不乏人，值得我们好好学习。但横向的研究，目前阶段，似感沉寂。现在我们有如下想法：

我们有必要进行主要受侨国侨务政策史的比较研究：

侨民史与世界史是交织着的，具体言之，其交叉点端在于各国的侨务政策史的变迁。侨务政策是服从外交政策的。侨务政策是世界政治风云、国际经济动向以及受侨国社会经济变化的直接体现。其亲甲疏乙、厚此薄彼的选择，一则显示对侨源国的政治态度，视其国力强弱、国际地位为转移，这就多少涉及世界政治格局的火候；二则显示错综复杂的国内政治派别、社会思潮与经济消长的局面。凡此都直接影响侨民的命运。以美国对中国侨民政策三次大起大落的过程来说，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斗争，就占了不小的比重⁽¹⁾，华工的竞争力量固然起了作用，但远不是决定性因素，因为美国对欧洲侨民是一直持开放政策的。⁽²⁾旅美华侨处境之改善，是中国的强大促成的，而中国的强大就决不仅止于影响美国侨务政策的改变，这正是属于世界史范围的事，因此，侨史研究的世界史方面，就必须包括主要受侨国侨务政策史的研究，而这种专业史的研究虽属于世界史范围，但世界史并没有这种专业，因此，它就必须从属于侨史了。

我们有必要从比较历史学的角度研究各国侨民活动史：

这方面有许多众所皆知而又发人深省的事实，促使我们提出这个课题。有人诬蔑华侨“干涉侨居国内政”。但大家都知道，好战的、侵略成性的以色列，它的政治靠山就是美国政府，对以色列侵略行为的国际制裁，照例遭到美国的否决。此中缘故虽然复杂，但有一点却不容忽视，那就是侨居美国的三百万犹太人对美国政府政策的实质影响，犹太人的强大的“院外活动集团”(Jews lobby)影响着美国政府对以色列的政治决策。我们的侨胞是谈不上这一点的，又如何能说他们“干涉侨居国内政”呢？在其他的华侨侨居国情况也一样。又有人诬蔑华侨是什么“社会离心力量”。但以波兰为例，由波兰政府当局资助的为数众多的神学院，逐年向欧美各国派出天主教传教士，在美国并当上了许多教区的主教，对波兰侨民进行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教育，影响所及，甚至使日化率也随之降低。我们的侨胞也远不足以语此，又如何能说他们与侨居国离心离德呢？又如有人诬蔑说“侨汇是吸血鬼行径”。但拿南斯拉夫来看，他们的海外侨民为数不多，而每年创汇额甚高，远远超过我国侨胞之众与侨汇之低的比率，这又如何能扯得上“吸血鬼”的恶谥呢？这样对比研究之下，雄辩的事实就可以驳倒无中生有的谎言了。此外，这种对比研究也可以供我们政务政策的制定和侨务工作的开展作参考，扬

长避短，发挥优势。

我们有必要进行华侨经济史的研究：

异国飘零，环境险恶，华侨居然能排除万难，艰苦创业，我们有必要注意华侨经营商业的创业史的研究。找出他们参与激烈的商业竞争的聪敏和智慧。据悉日本学人正准备研究东南亚华侨“经商术”，不惜为此耗费重资，足见这个问题是值得专题研究的，尽管华侨经济史属资本主义经济范畴，但其中有些东西，不但具有史料价值，而且有许多道理可以作出科学的总结。

我们有必要开展华侨社会史的研究：

华侨社会原有血缘性组织（如宗亲会）、地缘性组织（如同乡会）及业缘性组织（如同业公会）作为纽带，这些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组织，以及道、会、门一类的秘密团体，从中国本土带到外国，气派与声势不减当年。例如新加坡的“竞争”与旧金山唐人街的“堂斗”，华侨飘零异乡，曾以此团结御侮，起了作用的。目前这些组织等秘密团体，在经济上逐渐熔汇成统一的“商会”，在政治上则参加到公开的政党里去了。这是资本主义吞噬封建关系的必然趋势。华侨社会的这一沧桑变史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其具体内容及客观规律，而华侨社会在侨居国还面临着许多新问题，拿家庭来说，就有所谓“小联合国”的问题；拿金融问题来说，就有“财团化”和“跨国公司化”的新潮流；拿社会活动来说，就有所谓“认同”问题，而最严重的问题是归宿，即所谓“落叶归根”还是“就地生根”的问题，这涉及民族同化问题，也就是侨民活动的消失问题。总之，华侨社会史的研究，就其本质来说，可以说是华侨史研究的逆向运动——即华侨从大到小，从有到无的未来动向的研究，也可以说就是一门华侨史的未来学。

我们有必要开展华侨文化史的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在侨胞中的表现形态是丰富多采、感人至深的，这是维系他们对母国亲予之情的精神纽带。他们设立神龛供奉家乡的一撮泥土，聚资修筑家乡民间庙寺，教育子女不忘母国语言文字，并在科学技术与文化领域中开出了炎黄子孙的智慧之花，结出了累累硕果。侨胞占美国第一流科学家、工程师人数的四分之一，在加拿大中国移民的职业地位也名列前茅。侨胞中人材辈出，冠英卓秀。文化史包括教育史、报业史、科技史等。对这些进行整理研究，都必将是中国历史的壮丽篇章。

我们有必要开展华侨史上法律问题的研究：

例如《蒲安臣条约》在美国华侨政策变迁中的法律地位；在“入籍”问题上，华侨的心理动向、客观因素、个人遭遇以及悬而未决的问题等。外交保护权是华侨享有的公民权利，这方面的研究与是与我国崇高的国格相适应的。

而特别具有重大意义的专题，是侨胞与母国关系史的研究。辛亥革命的成功，华侨出力殊多，但中国史书上未予评价，抗日战争的胜利，华侨亦与有功，正史上亦无任何记载。解放后，随着祖国的繁荣昌盛，国际地位蒸蒸日上，侨胞均以母国自豪，探亲访祖者络绎不绝，对母国的建设亦争相鼎助，并致力于中华民族大团结的神圣事业。他们的不朽贡献，实有争辉于日月，惊天地而泣鬼神者，这些都值得我们大书一笔，广为传播，垂训子孙万代。

总之，我们认为侨史研究的范围无比广阔，应予研究的问题和探索的方面甚多，这里不过是择其主要者略论而已。

以下谈谈华侨史研究的任务。

四、华侨史研究的任务

华侨史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华侨史研究是一项学术研究，我们应根据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探明侨胞对母国对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作的不可磨灭的勋绩，还他们一个历史的真面目。作为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支，华侨史研究的任务应该是：

1. 探究华侨活动这个社会——历史现象形成的原因、过程与变迁。这段历史的描绘，要忠实于信史和实录（包括当代采访材料），要尊重历史事件的要素，归结为真名实姓的人、查有实据的事、确凿无疑的时间和地点。一般说来，华侨活动鼎盛于19世纪下半叶，即封建主义世界体系的解体和资本主义转向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兴起这段时期，应从这个历史背景上来作华侨史的探索，从而找出华侨史本身的内在规律来；

2. 密切海外侨胞与祖国的联系。朋友关系固弥足珍重，血亲情谊则更深一层。人世间哪怕有至珍至贵的东西，要拿来替换、抽调和取代我们血管中循环不息并世代相传的炎黄子孙的血液，这也是办不到的。华侨史研究的对象已经明确，他们作为“海外弃儿”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全心全意地接待他们，他们是我们民族的亲骨肉，情逾家人，

我们将尽情讴歌他们的光辉业绩，激励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务使我们的情谊山山水水隔不断，世代万年长；

3. 促进我国与侨胞所在国的国际交往。我们是学术研究单位，对侨胞的历史进行探讨，并不带有任何种族偏见，这是每个有海外侨民的国家所必然要研究的项目。正如同上引欧洲向新大陆移民高潮所揭示的同一个道理，中国移民从来不曾是哪个王朝或哪个政府的殖民部队，也不曾成为奴役所在国人民的统治者或垄断其经济命脉的掠夺者。据近代史的纪载，早期出国的移民都蹲过“巴拉坑”（“猪仔馆”），订过卖身契，也就是说是在迫于天灾人祸而背井离乡的贫苦劳动人民，无论到南洋、南非，到美洲、澳洲，他们都遭受过非人的歧视与剥削。到目前为止，他们对所在国的发展与繁荣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也受到了一定的尊重与礼遇。正因为华侨在所在国是受到欢迎的人，我们对华侨历史的研究，肯定也会受到所在国的欢迎。我们对华侨的关系密切了，也就是对侨居国的关系密切了。我们希望广大华侨能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对侨居国也寄托着同样的希望。

4. 维护世界和平安定的局面。有逾千万侨胞遍布全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是世界持久和平的稳定力量。我们加强与侨胞的联系，就是为巩固世界和平而工作。我们相信，一切热爱和平的正义人士都会给我们的工作以支持。

我们的华侨史研究室成立伊始，百事待举，以上是我们对华侨史研究工作的对象、课题和任务的一点初步的粗浅的看法，不知是否有误，恭请方家们指正。如果无大错误的话，我们将据此开展工作，满怀热情、全心全意地来谱写华侨史这部无比瑰丽的史诗。

1981年12月于上海丽娃河畔

(美) 中国文化基金会执行主席

吴定一

初期移民

据法国汉学家几内斯的意见，中国人早在公元502—556年就在北美出现，比哥伦布早一千年。照官方的说法，中国人自独立战争以后才在美国的海岸出现，美国移民局档案有1820年第一批入境的中国人的记录。

1848年加州发现金矿，中国人开始来到“金山”，人数续有增加。

群雄内鬬和太平天国革命更恶化了哀怜无告的农民的处境，他们一无所有，不怕损失，乃动身前往加州，来到这个黄金国土碰碰运气。

那些无力支付路费的人利用了“赊单”制度，签定合同以未来的收入偿还。稍迟，劳动力需要益形尖锐，美国公司乃通过中国的或外国的劳工承包商进行招募。在此情况下，船费提高了，契约工做完工期，从工资中扣除船费。

这种“苦力”在北美的劳工招募中并非是一个巨大的因素。“苦力”这个称呼经常强加在这里的中国劳工头上，其实他们同南美和世界其他地方那些被强制招募和接受奴隶劳动待遇的中国劳工是显然不同的。

“华埠”形成

北美第一座“华埠”估计是座落在旧金山的那一座，约造成于1848—49年之后不久。

第一批到达的几百名中国人，在那些早已在这里的许多人当中多少有些孤立。显然由于他们的出现，他们服装的式样、语言和风俗，他们发现自己受到冷落。为了团结一致，他们不与别人往来，并在萨克拉门托街修造了他们自己的“城”。中文称为“唐人街”或“华人街”。他们群居一起，建立起他们欣欣向荣的“华埠”，地区逐渐扩大到目前的规模。

大多数人员是短期居留，然后就到黄金国土去碰运气。工作是艰苦

的，工作时间是长的，他们忙于寻找黄金。随着逐渐形成的麻烦以及日益兴起的反华情绪，中国人开始回到较大的城镇和都会。得不到殷勤的接待，他们发现难以形成美国生活主流的一部分，因此他们对中国习惯与语言坚持不变。

受雇的机会愈来愈少，他们变成了洗衣工人、家庭佣人、厨师、侍者和洗碗碟的人或从事任何可以得到工作的人。

这些逗留者来到加州原是希望弄到一笔钱就回中国去的，所以他们很少带妇女同行。大多数人都没有家庭生活。由于工作时间长、干活艰苦、责任十分单调，这个大多数为男性的集团便转向赌博以及诸如宿娼、吸大烟等罪恶行径去了。

那些卖给他们家常食物和衣着的得到信任的商店，成了他们的通讯处，他们可以从那里收到中国老家寄来的信。这些商店也租借给这些短期旅客库房，因为他们必须经常迁动去寻找工作。老百姓家和地区社团也供应住处、膳宿、娱乐以及他们与中国乡亲谈话用的地方。

直到很久以后，差不多到1882年排华法案公布，很多人都决定在此地永久居留，妇女们和孩子们的出现变得引人注目了。

“华埠”变成了一座城中之城，一个人可以在它的范围内出生、生活和老死而无须离开此地区，因为里面应有尽有，可供享用。

直到二十世纪，中国人才十分安全地感到他们可以离群索处，独立工作。

学生留美

“当现代世界冲突的浓烟消散，事态能再一次加以适当的考查时，有件事肯定会清楚起来，那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强大的和独立的国家出现，乃是现代最重要的现象中的一个。自从上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已经发生的、令人瞩目的文艺复兴运动，应该追溯到最初那几个大胆而勇敢地冲决长期以来的传统和习惯并开始学习西方文化的人身上。正是从这些最初接受外国文化的先驱者那里，才传布和成长起造就今天的中国的力量。首先，我们必须了解容闳的经历和影响，他是先驱者中的先驱者……

（《中国的第一个一百》，托玛斯·亚·拉法格，华盛顿州立大学出版社，1942）。

容闳是第一个在美国学院就读的中国大学生。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第二年他成为美国公民，是第一个加入美国籍的中国人。回到

中国后，他担任过许多官方和半官方的职务，他成功地说服清王朝成立一个中国教育使团（1872—81），容闳任监督，使团总部设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特。一百二十名中国学生来到这里，随带中国教师继续给他们讲授中国文化。这个使团不幸在九年以后由于中国政局变动而撤销。

金矿开采

1850年加州57781个矿工中只有500个中国人，到1870年中国矿工增加到9087人，占加州矿工总人数的25%。“华埠”在许多矿城中兴起，甚至到今天，一个世纪以前他们住所的遗迹仍历历在目。起初大多数人是独立矿工，但有些人很快组成公司，随着猛烈的竞争愈趋愈烈，团结互助的需要变得愈来愈迫切了。

除了一般采用的“摇篮”或“摇臂”式以外，中国人发展了“风堤”式设施，系用大松树筑成，长约2、3百码，这种方式是别国矿工所没有的。中国人还革新了一种链条式抽水机，每边由一人旋转，成为一根轮轴上装四根轮辐的踏车。

1863年以后，许多中国公司来到矿区，买下了矿区土地，清除残址重新工作。中国人在西方开矿的顶峰时期中，中国矿工占加州和华盛顿矿工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占蒙塔纳的五分之一，在俄勒冈和爱达荷则超过一半。

铁路筑筑

1866—69年，美国开始修筑大西洋和太平洋两岸第一条国有跨州铁路。劳工缺少而昂贵。1864年一位踌躇不决的工头决定了一个雇用五十名本地华工的试验期，他们的报酬是月薪25美元，而大多数白人劳工得到了月薪35美元，外加膳宿。华工立即证明是成功的。克劳克当时就承认说：“他们拼命工作以讨得我们欢心，如果我们急于完工的话，最好马上就雇用中国人”。（查理士·克劳克证词，参议院报告第689号）

中央太平洋公司把华工人数增加到一万二千至一万四千之间。铁路工作人员中十分之九是中国人。省长斯坦福1865年10月1日致安德鲁·约翰逊总统报告中说：“作为一个阶级，他们是安静、和平、忍耐、勤劳和节俭的……，没有他们，这个巨大的国家工程的西部一段就不可能在议院法案要求的时间里完成”。